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1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1 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1

ISBN 7 - 80149 - 791 - 0

. 中... . 中... . 中国 - 近代史 - 文集 中国 - 现代史 - 文集 . K250.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7368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1 年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文桂 杨 群

责任校对: 齐 力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 电话 65139963 ■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2

字 数: 55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791 - 0/K · 115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张海鹏 (1)
-----------	---------

洋务运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兼论其对清末政局走向的影响	马平安 (1)
-----------------------	---------

试论戊戌—庚子政局变动中的张之洞	李细珠 (17)
------------------------	----------

民初主要政党的政治主张	邹小站 (44)
-------------------	----------

“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

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	赵利栋 (60)
-----------------	----------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 世纪 30 年代

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	王奇生 (97)
-------------------	----------

宁粤对峙前后的冯玉祥	金以林 (130)
------------------	-----------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研究	程朝云 (151)
-------------------------	-----------

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	王士花 (175)
---------------------	-----------

慰安妇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刘 萍 (192)
历史教科书问题: 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卞修跃 (201)
翁文灏中国工业化思想初探	李学通 (239)
论储安平之投奔解放区	赵一顺 (254)
关于晚清驻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问题	戴东阳 (275)
试论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	崔志海 (291)
抗战期间中法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	葛夫平 (322)
战后中国对越政策的演变——以中国国民党 对越党派工作为中心的探讨	罗 敏 (347)
近代中国海关的反走私努力与 1948 年 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的签订	张俊义 (387)
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若干问题的历史 考察与思考	栾景河 (402)
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兼论 其登极后的结局	夏春涛 (429)
试论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中的请托活动	唐仕春 (450)
20 世纪上半期香港社会结构分层研究	张 丽 (475)
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	吕文浩 (505)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罗检秋 (531)
早期改良派民权思想的演变	王法周 (565)
“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贺 渊 (582)
通向成熟的桥梁：中国哲学会及其年会	左玉河 (606)
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 ——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探讨	刘 巍 (656)

序 言

今年7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央也需要掌握一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他同时指出，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要求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激励、选拔和任用的良好机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茁壮成长”。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提出了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茁壮成长的良好机制的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计划在今年9月出版，正好与我所第四届青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相衔接。一年前的8月，所里在延庆召开了第三届青年学术讨论会。向这次讨论会提供论文的青年学者有27人（金以林在新加坡大学学习，崔志海、葛夫平在哈佛大学访问，三位均提交了论文，未能出席会议）。出席这次讨论会的，除了40岁以下的本所青年学者，还有本所各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近60人。我们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出席指导。适逢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应邀在本所访问，也有机会观摩了本所的青年学术讨论会。因此本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准国际会议。

以上提及的 27 篇论文，分别从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现象，有些研究是很深入的。讨论会气氛热烈，质疑和答辩都非常认真。与会学者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我认为，抓紧培养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题中应有之意。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做法，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我很高兴地向读者介绍，我所致力于培养青年学者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国际学者的注意。出席我所召开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 年 9 月）的外国学者对此做出了反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所长 Wakeman 教授，是很知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专家，坐着轮椅赴会，对近代史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推出青年学者，深表称赞。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俄中友协理事会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回国后，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刊物《近现代史》2001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会议所做的学术评论，另一篇很短，是对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人才成长的介绍和评论。这篇短文题为：《中国培养青年学者的经验》。全文不长，引述如下：

去年年底（按：应为 9 月）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144 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史学会主席金冲及向大会致词时特别提请与会者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培养青年历史学者方面的经验，对于 1966 年至 1976 年“文化革命”中受害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就是接班人了。这一成绩在讨论会上看得很清楚，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一半多（按：此处不准）是该

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写的。再过 10 年，到 2010 年，这些青年学者将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核心力量。

以张海鹏为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为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尽其可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介绍他们承担特别资助的研究课题，要求他们去查看档案资料，对完成的工作给与奖励；派遣他们到国外进行长期的学术访问，出版青年学者的《青年学术论坛》。新近出版的 1999 年卷篇幅达 540 页之多。

同时，该研究所还特别关注中俄关系史专门人才的培养。

我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借《近现代史》杂志对中国经验的介绍，促使俄国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们更加注意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包括中国学研究人员的培养；提请他们注意学术带头人老化的现象。中国“文化革命”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我国对中国学研究人员的培养也大为缩减。

应当立即改变这种状况，立即组织高校和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对中国学研究青年专家，特别是俄中、苏中关系史研究专家的培养。

（译自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2001 年第 3 期，第 212 页）。

齐赫文斯基院士向俄罗斯科学院的所长们介绍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

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这样的文章，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我们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近代史研究所现有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 40 人，其中博士 15 人，博士后 5 人，硕士 20 人，有两人晋升为研究员，一人晋升为编审，17 人为副研究员。41~50 岁的研究人员 26 人，51 岁以上的研究人员也有 26 人。十年前我们担心的青黄不接的情况，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为了使逐年增加的年轻

朋友继承近代史研究所的学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研究所的未来在于青年，我国学术界的未来也在于青年。面对 21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我们要努力推动我们的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使他们尽早为学术界所认识，所接受。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这是我希望，也是我所老一代学者的共同希望。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书记还勉励我们的学者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做一名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真是语重心长，期望殷切！作为学者，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再努力！作为肩负着重要职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们要根据党和国家提出的任务，搞好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要多注重人才机制的制度设计。用这种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保证我们的人才成长的环境，保证我们有纯正的学风。

本卷收集论文 27 篇，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发表。请各位读者，请各位关心青年成长的前辈们不吝指正！

本卷的编辑工作是由本书编辑组承担的。他们是：黄春生、王奇生、左玉河、刘红、陈于武。我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任务！

张海鹏

2002 年 7 月 23 日

于东厂胡同一号

洋务运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兼论其对清末政局走向的影响

马平安

在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清政府以“自强”、“求富”、“新政”相标榜，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央以奕 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为代表。他们先后建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创建了新式的海陆军。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挽救危亡、企图重振雄风的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好时机。在此期间，中央和地方关系暗流涌动，较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对清末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中央方面，在解决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问题，与列强暂时取得妥协，并重新收回相权后，慈禧就开始努力再次确立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

（一）扩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权限，收回汉族督抚的对外交涉权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现于咸丰末年，于 1861 年 1 月 20 日成立，至 1901 年 7 月 24 日改组更名为外务部，共存在 40

年。总理衙门的成立，从对外关系来说，标志着清政府传统的对外关系的终结和近代对外关系的确立，从对内关系来讲，则是因为大批汉族地主官僚担任督抚，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引起满洲权贵严重不安的结果。从官员的来源来看，总理衙门从主管官员总理大臣到办事官员都仿照军机处的办法由皇帝从内阁、军机处、各部院满汉大臣中指派专人兼任；从机构的编制来看，总理衙门与军机处一样，官员的设置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从职权方面来看，总理衙门也与军机处一样，都是皇帝直接指挥的中枢机构。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务的手续上虽然不能越过军机处，各处的文件都要经过军机处转达总理衙门，但是军机处不能过问外交事务。这样，在实际上总理衙门与军机处就形成分工，总理衙门专管对外事务。

在洋务运动期间，为了达到控制地方的目的，总理衙门管理的范围和权限大大膨胀：财政经济方面，有办理通商税务之权；外交方面，所有对外通商、交涉、条约谈判与签字，乃至使臣的接待等等，全由总理衙门经办；军事方面，兼掌兵部事务，“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主之”；司法方面，中外案件交涉一并兼管；营造方面，主持船政、铁路、矿务等事务；文教方面，兼掌教育之权。尤其重要的是，总理衙门还拥有直接或间接指挥地方的权力。“嗣后各省将军、府尹、督抚、通商大臣、钦差大臣应办事件，随时咨报京城总理处”，“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报纸，无论汉字及外国字，钦差大臣及通商大臣并各该省将军、府尹、督抚均按月咨送总理处”。从制度上说，通商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不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成员，但在洋务运动时期，通商大臣所有上奏事件均须会咨总理衙门。这样，总理衙门的设立与职掌范围的扩张，就分取了地方督抚的许多实际权力，有利于中央加强集权和对地方实行较为有效的控制。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二) 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以分南洋通商大臣的权力。1840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乱了清朝的指挥系统，引起了地方督抚职掌的变化。战前，有关对外交涉多由中央的理藩院、鸿胪寺等负责办理，外国使臣由礼部和理藩院安排接待。地方督抚除两广总督稍有例外，都无对外交涉的权力。从澳门来的外商，外国商务使节如有请求、交涉事宜，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陈，再由两广总督或广东巡抚转奏，请命皇帝。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清廷不得不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相机“羁縻”，“开导”。于是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先后同英军谈判交涉。1842年8月，道光帝命令两江总督耆英与伊里布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继后又命令他们同美、法等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打破了地方督抚从不与闻外交的格局和传统的做法，开创了地方官员参与对外交涉的先例。1844年，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将派驻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办理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改由两广总督兼任。1859年，五口通商大臣随着对外贸易经济中心的转移，改而移驻上海，并由两江总督兼任。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汉族地主势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督抚如叶名琛、黄宗汉、何桂清、薛焕、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是汉族官僚。这样，引起了清统治者的疑虑。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坐镇两江，大权包揽，频频开怀交纳外人，更是让清廷放心不下。于是，清政府采取分权政策，把通商大臣一分为二，南北各一，以削夺汉族地方官僚在洋务外交方面的过重权力。在讨论薛焕担任南洋通商大臣一职时，奕訢就说过：通商交涉者若由两江兼任“事务更繁，诚恐该督曾国藩兼司其事，非特鞭长莫及，并虑未能谙悉夷情”。其实，这里“并虑未能谙悉夷情”是假，害怕汉族地方官僚权

力过大是真。清政府正是借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一事，削减东南督抚尤其是湘系集团的对外交涉权力，以防止他们与列强结交而尾大不掉。因此，三口通商大臣开始设为专职，并由奕 得力帮手、侍郎衔候补京堂满人崇厚担任，负责管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交涉事务，阴与“南洋”抗衡，旨在分南洋通商大臣的通商交涉权力。

（三）化勇为兵，将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时期开创的勇营体制纳入中央集权的系统之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就开始了重整绿营，裁抑湘勇的努力。自湘军攻陷安庆、对太平军稳操胜券以来，在朝廷授意下就不断有人奏请恢复绿营额兵。同治元年，江西巡抚沈葆楨奏请整顿江西绿营；同治二年又有人要求恢复浙江绿营；同治三年先是安徽巡抚唐训方转呈僧格林沁要求曾国藩恢复安徽绿营在先，接着又有山东巡抚阎敬铭奏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以矫“专用南勇”之弊，兼杜“轻视朝廷之渐”。再后，以复绿营抑湘勇之势紧锣密鼓，只是由于多隆阿，僧格林沁先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战死，加上湘、淮集团极力抵抗才未能一时如愿。在太平军、捻军平定后，清廷开始大肆裁减湘、淮二勇。同时鉴于已无兵可用，“防营成为劲旅，有事兵不如勇”的状况，决定改变政策，改裁为留，将勇军改为防军，承认其为国家的经制之兵，从制度上、饷源上将之纳入中央的控制之中。同时，清廷还加快了改造绿营的步伐。1865年，清政府兵部、户部召开会议选练直隶六军，确定了“练军”的名称。在实行改勇营为防军、整顿绿营为练军的同时，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了改变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武装迅速膨胀的局面，清廷又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工业。1866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八，《阎敬铭传》。

林代昭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第80页，重庆出版社，1988。

年，恭亲王奕 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各种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划。崇厚奉旨后，一面觅雇工匠，购地建厂；一面购买机器，开始建立中央自己的军工。他首先委托英国人密妥士赴英采购机器，不久又听取了就近采办的建议，在上海、香港等地也购买了一部分机器。1870 年筹建工作基本完成，自英国购买的机器安置在天津城东贾家站，是为东局，规模较大，自上海、香港购置的机器安置在城南海光寺，是为西局。两局都是天津机器局的一部分。

（四）设立海军衙门，通过这个机构把几支由地方分掌的海军权力收回，统一由中央政府指挥起来。中国创建海军，始于曾国藩的购舰之议，当挫于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后，曾氏复认为与其购买外国船舰，还不如自己购其机器自行制造为宜，开始选觅能工巧匠，进行战船制造的实验。此后，1866 年，左宗棠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与此同时，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江南制造局，中国海军开始筹办。到 1884 年，由地方创办的水师已经粗具规模，北洋海军有战舰 14 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管辖奉天、直隶、山东海面；南洋海军有战舰 17 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海军有战舰 11 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厦门及琼崖海面。在这种情况下，1885 年，清政府决定设立海军衙门，把地方控制的水师大权收归中央。9 月，清廷任命醇亲王奕 为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 、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满人善庆及曾纪泽为帮办。清政府这样的人事安排，用意很深，一方面加强了统一领导，大权归于中央；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李鸿章、曾纪泽、左宗棠等地方汉人督抚制约海军的权力。但是，由于醇亲王奕 昏庸无能，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奕 又唯唯诺诺，善庆地位很低，因此，海军衙门名义上是管理和指挥全国海军的机构，实则无权，权力仍操纵在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等人的手中。

（五）从财政上剥夺地方的利源。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地

方财政的增长，奏销制度的松弛，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掌握全国各地的财政收支的准确情况，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中央与地方专项经费和税收分成的办法，以此为途径来改变地方财政权力过大的情况。

本来，“在清朝财政制度中，本无中央专项经费之名，地方寸留之外，统归中央调度，无须专设经费名目。偶设专项经费名目，也只是中央从各省报解银数中专列一会计科目，以便核算，无关乎解协饷制度。而同治以后所设专项经费，则是由中央规定一项专项经费的总额，然后分摊到各省关，在形式上仍采取指拨的方式。这是在承认地方财政利益的前提下，用于确保中央财政需要的一种变通措施。这种专项经费，是根据户部已掌握的各省关的‘的款’（确有款项）来进行指拨的，至于指拨之后地方财政有无机动的非经制开支，户部是不管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央专项经费主要有京饷、固本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京师旗营加饷、海防经费、备荒经费、船政经费、出使经费、铁路经费、内务府经费等十余种。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向地方所摊派的各项专项经费，“是为了确保各省新增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的份额”。

在国家的税收分成问题上，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各口洋税大多为地方截留，中央几乎无从染指。对此，清政府自然十分不满，但迫于当时客观情况，还是容忍了下来。战争过后，清廷立即通过对外赔款，间接地取得了四成洋税的支配权。“到1866年赔款偿清以后，四成洋税就成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财源”。在子口税与厘金问题上，清政府也不满足“厘金征收利归督抚，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242页。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245页。

而子口税收入，利归中央”的现状。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洋货进入内地，在交纳了子口税之后，不再交纳厘金。通过这项规定，清廷实际上就把原来一部分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重新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地方财政的攘夺情况。

（六）运用操纵、平衡之术，控制、操纵几个主要的地方集团。洋务运动时期，鉴于湘系集团的强大，清廷采取的对策是“扬淮抑湘”与“扬左抑曾”，用分化瓦解手段，迫使曾国藩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非分之念。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湘军的裁抑，曾国藩的死去，湘军集团已构不成对朝廷的威胁。随着李鸿章淮军集团的膨胀，清政府又采取了“扬左抑淮”、“用左制李”的政策，扶植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与李鸿章淮军集团抗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海塞防之争问题上，清政府针对左、李二集团的利益分别加以操纵，即使李、左各自发展，分别发展海防与收复新疆，控制西北；又使二者互相竞争，各不相让。为了制约李鸿章，清政府甚至两次调左宗棠入驻中枢，并发展福建水师，“益扬左以抑李”。只是由于左宗棠为相能力甚差与老朽不堪而未能满足清廷制约李鸿章集团的目的。醇亲王奕訢就曾经说过：“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势力衰落，洋务派形成了淮系一枝独秀的局面。清中央统治者慈禧又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政策，以期达到牵制淮系势力的目的。如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筹建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246页。

苑书义：《李鸿章传》，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94。

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岳麓书社，1986。

苑书义：《李鸿章传》，第158页。

中的枪炮厂发生去留问题。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洋务并不热心，不愿接办，但他却积极建议将枪炮厂移往北洋，由胞弟李鸿章接管，李鸿章喜不自禁，立即响应。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 对淮系势力过分膨胀十分担忧，有意扶植张之洞，以便与之抗衡，乃暗示张之洞继续办枪炮厂。张之洞随即要求枪炮厂移鄂，所需款项仍由粤省垫付，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同批准了张之洞的要求。最后，厂址选在汉阳大别山麓，1893 年全部建成，这就是湖北枪炮厂的由来。正是在清政府的扶植下，张之洞迅速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对慈禧、奕 的这种掣肘裁抑，李鸿章即大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甚至一度把希望寄予光绪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总结其举办的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对慈禧及清流派的不满溢于言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鼎盛时期。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洋务派对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既要依靠洋务派，又担心洋务派失去驾驭，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又玩弄起“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鼓励一些大学士、言官和御史制造舆论，抨击时政，弹劾权贵，

《复鲍华潭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 10 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 107 页，岳麓书社，1985。